

林增平文存

林增平 著

中華書局

林 增 平 文 存

林增平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增平文存/林增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353-X

I. 林… II. 林… III. ①林增平(1923~1992)
一文集②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1119号

-
- | | |
|------|--|
| 书 名 | 林增平文存 |
| 著 者 | 林增平 |
| 责任编辑 | 欧阳红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6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4 字数480千字 |
| 印 数 | 1-2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353-X/K·2389 |
| 定 价 | 48.00元 |
-

治史琐言（代序）

我的老家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镇的东北角，始祖从福建莆田县迁来。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一直聚族而居，故地名称林家坊。父道一，民国初年入湖南高等工业学堂学机械专业，1923年在安源煤矿任技师。那年岁杪，我出生于安源，未满一岁，随母亲回老家居住，取名增禄。6岁进族中设立的小学念书，启蒙老师周先生大约是觉得增禄这名字有点俗气，替我改名增平。刚满9岁，随父母迁居南昌，继续上小学。1935年在南昌北营坊小学毕业。

小学阶段，我的学业成绩一直是中下水平，仅免于留级而已。毕业后，考入在江西颇有名气的南昌心远中学。尽管侥幸跨进了中学的门槛，但毕竟经不起那严格的筛选，所以，念完一年级，就因为考试不及格的课程达到了留级的界线，于是当了“降班生”，重读一年。抗日战争开始后，1938年随父母进入四川，转到成都石室中学上初中三年级。可能是那次留级产生了些鞭策作用，因而转到四川这所名牌学校后也逐渐能跟上班，由初中一直读到高中三年级。高中阶段，为避日寇飞机轰炸，学校疏散到新繁县清凉寺，离县城约五六里，除利用寺内破旧殿堂外，教室和大部分宿舍都是稻草盖的茅屋。伙食很差，每到星期日，照例是三五同学凑钱打平伙，买两斤肉，几斤萝卜，就地刨个坑，拾点干枝桠，炖一大锅，以飧饕餮。晚间每人一盏菜油灯，光照昏

黄，往往烧得头发吱吱叫。1940年冬的一个午夜，汉奸潜入寺内，纵火焚烧校舍，霎时红光烛天。我被惊醒，朝窗外一望，但见火舌四撩，慌忙一骨碌滚到地下，拿起脸盆偕同学奋力救火。“火神”毁了一排教堂，才被赶走（在这前后一两天疏散到市郊的成都中学被一炬成焦土）。之后，我们不得不轮流值夜护校。事隔40多年，偶尔想起，恍惚如昨。

1941年末，父亲转到湖南芷江工作，我不能不相随出川，返回家乡，入萍乡中学借读半年，于1942年夏高中毕业。时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均为敌占，故毕业后除被保送免试上国立浙江大学（迁设于贵州遵义）师范学院外，只能就近报考刚刚开办两年的国立中正大学（创设于当时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县杏岭）。放榜时，得录取人文法学院文史系。10月绕道赶到赣州城外分校入学。入校时，同系同学约20人。翌年，转到泰和本校，原先同班的绝大多数转到别的系去了。

1944年的春夏间，杏岭伤寒病流行。国难方殷，学生体质差，又缺医少药，致相继感染伤寒的同学连续死了几个，数十人住进医院。校内人人自危，一派惶恐凄凉景象。阃隍不安地折腾匝月，才告缓解。暑假期间，侵华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旁扰赣中，学校被迫仓猝迁往宁都长胜圩。我因祖母去世，道途阻梗，只得休学一年，在家乡濂溪小学教书。

1945年秋，抗战胜利，学校迁到南昌望城岗，大部分校舍是旧军营。我复学时，文史系分为中文、历史两系，同班同学4人。念完三年级，抗战胜利已历1年，仍然是疮痍满目，百废未兴。暑期回家，从南昌至萍乡的铁路、公路都未修复，只好结伴沿着荒废的公路步行，冒酷暑走了一个星期，才抵达家乡。随后，继续在艰困的条件下念完四年级，于1947年毕业，获学士

学位。旋即留系任助教。

解放前，历史系是“冷门”之一。我之所以株守在这个“冷门”内，主要是对它感兴趣，并图谋获得一个仅免于饥寒的文史教师的席位。但由于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将史学当作一门记问之学来研习，因而仅能熟悉一桩桩的史事过程，在阅读古籍，整理和考订史事等方面，练就了一点较浅易的基本功。这里，我只就阅读古籍谈谈自己的体会和受益。我觉得，读懂古籍，当然少不了请教老师，掌握点古汉语语法知识，但更主要的是精读和背诵一定数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而且，选读的范围得广泛些，不但要读古代散文（包括史籍中的书、志、纪、传等），也要拣选诗、词、歌、赋等类韵文若干篇精读以至背诵。读到一定数量，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就大体了解，翻开一篇未曾浏览过的古文，没有标点，也不致读不下去。同时，这对于撰写文章，也大有裨益。当然，我们现在不宜再模仿古人写文言文，但写现代白话文，却能从古文中得到很多的启发。大凡流传至今，诸家选录的古代名篇，无不文笔精练，结构严谨，起承转合，顺理成章；写景状物，则描绘逼真，立论辩道，则提要钩玄，一般都足资取法。读熟了，用于抒情、叙事、析理、述评的词汇，贮存于脑际，写起文章来，随时都能转送到笔端，增添文采，避免行文枯涩，索然寡味的缺陷。不过，我只是提倡读一定数量的古文，如果沉溺于古文词，食古不化，以至写文章时文白缠夹不清，那就是适得其反，有害无益的了。

1949年5月，南昌解放，中正大学由江西军管会接管，改名南昌大学。秋冬之际，进入八一革命大学学习，次年春仍返南昌大学工作，承担政治理论课的辅导和部分讲课任务。1951年秋，晋升讲师。在这前后的三四年间，我的主课是学习马克思主

义理论。初读马、恩、列、毛泽东著作，确有茅塞顿开的喜悦。尤其是展阅马、恩关于历史的论述时，每每读到这两位大师剖析精湛，显隐发微的论述，就不禁击节赞叹，不忍释卷。当年学习理论那种盎然兴趣，迫切心情，大堪回味。此外，也认真读几种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编撰历史的书籍，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诸家著作，读时还择要做些札记。无庸讳言，这些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纪事立论也间有失误。然而，在探索不同阶段社会性质，阐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揭示史事内在联系，勾绘社会发展轨迹等重大问题上，毕竟作了开创性的、向导性的工作，其先驱先路，嘉惠后学的作用，是应当承认的。

1953年秋，中南区进行院系调整，我调到湖南师院历史系任教。从那时起，每年都承担专科、本科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年都把讲义从头到尾校订、修改、充实、提高。经过四次轮回，这部讲义就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以《中国近代史》书名分上、下册出版。在这几年内，为把讲义修订好，我一般地说得上是专心致志，埋头苦干。除了炎天三伏，午睡这个程序是被我从日常生活里排斥出去了的；而且，还经常捐弃了文娱活动，开夜车是每日例行功课。这当然不足为训。但话又得说回来，做学问，在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应当下点苦功夫的。

在《中国近代史》的前言里，最后我写道：“本书体例、结构、取材等问题的处理，总的来说，都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得出的成果所赐予。”意思是书里基本上没有自己独到的系统见解。设计封面时，编辑同志在作者署名后写一个“著”字，我提笔改为“编”字，他建议来个折中，署为“编著”，我仍不让步，终于只用了一个“编”字。因为，我觉得

把讲义署作“著”是不恰当的。本来，我预计这部书出版后少则3年，多则5年，就只有“覆瓿”的用场。没料到过了20年，1979年竟重印了5万部，发行后销售较快。1979—1980年，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河北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湖南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专业研究生的简章上指定为必读参考书。这样，我就有点沾沾自喜了，因而当出版社于1982年第三次重印时，我请编辑同志把封面上那个“编”字去掉。虽没改为“著”字，意思是这部书不应当用“编”字来贬损它的著作价值了。1984年初第四次重印，又发行了3万多部。现在想起来，脸上确有点火辣辣的，感到自己颇不谦虚了。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推移，书里不少内容显然落在研究进度的后面，可由于抽不出时间来增删校改，所以四度重印我都不曾对书中存在的论述不当、史事讹误加以修正。对此，我只应深感内疚，怎么还骄傲起来呢？足见，做学问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良非易事。

进入60年代，临近40岁，我把自己的探索领域收缩到辛亥革命这个阶段上。1961年应中华书局约，写了一本《辛亥革命》小册子，编入《知识丛书》出版。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几篇文章论述了会党问题，认为会党是农民的组织，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通过联络和发动会党，形成了与农民的松懈联盟；这个联盟的维系和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高涨和失败。我对此持不同意见，会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游民急剧增加、会党的约规和习尚反映了游民的利益和愿望、革命派多次起义所发动的会党成员主要是游民等几方面加以阐述，论证了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是游民的结社而不是农民的团体。因此，革命派与会党联系的亲密或疏远，对革命的

高涨或失败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自1908年后，革命派联络的重点也转向新军，而且正由于约半数的新军反正，才出现武昌首义和全国响应的高潮。1984年我再写一篇题为《会党与辛亥革命》的文章，重申己见，并依据史料，进一步论证。在会党的誓词，会规中，没有发现与封建制度下小农经济有关的，诸如耕田力作，安土重迁等一类词汇，也没有体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反映农民渴求土地的条文，说明会党不是农村生活的产物。而且，大量档案证实，起源于清乾隆中叶的天地会，宗旨是“一人有难，大家相帮”，并非以“反清复明”为目的；多次会党起事，一般都以“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铲富济贫”相号召，没有揭橥“反清复明”旗号的。因此，认为会党素以“反清”为主旨，同革命派力倡“排满”基本一致，从而构成二者具有结成联盟的政治基础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因为研究领域收缩到辛亥革命一段，于是，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考察就显得很必要。我感到，既然中国资产阶级搞革命是步西方前辈的后尘，却又因时过境迁和本身的软弱而不能赢得胜利，那么，探讨一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异同，当是可行的办法。因此，我就从这个方法入手，首先作如下比较研究：

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共产党宣言》）

在中国，“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从两者来源的不同，论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正因蒙受不白之冤，失去自由的吕振羽同志，居然在监禁中撰写评述，大体赞同我的观点，并给以匡正补充（吕文在去世后才发

表)。正当我就这一课题继续探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许多同行一样,研究工作停顿了10年。令人不无遗憾的是,从学识、精力等方面来说,这正是我能够提供若干稍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10年。

“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政方针,把一切工作,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引上了稳步发展,日趋繁荣的境地。我也得以重新投身研究工作者的行列。1976年冬起,我襄助章开源同志邀集中南和四川、贵州等省的同行友人,主编一部《辛亥革命史》,到1981年春完稿,全书达12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书出后,国内(包括台湾)外均有评论。日本冈山大学副教授石田米子在题为《辛亥革命通史的新成果》一文里写道:“……具体的进行过程我无从了解,但是在国土面积和交通情况都与日本不同的中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邀集这么许多研究者共同协力,写出这部通史,一定要具有很高的热情和付出艰巨的劳动吧。有120万字,1700页的《辛亥革命史》,把从1901年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段时期作为对象,但叙述却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一直写到作为辛亥革命余波的护法运动。末尾还附有大事年表、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无论是从参与编写的众多人数,为增强说服力而提供的丰富材料,还是从涉及问题的广阔范围来说,这部书都可视三十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载霞山会《东亚》183号)这位副教授的评述容有过誉,但有一点她是说得很切合实际的,即在章开源同志主持下,我们编写组二十多人确实做到了通力合作,和衷共济的。否则,要在不到5年的期间协作完成这部120万字的学术著作,是不可能的。当然,毕竟是时间不长,编写组成员过于分散,因而全书仍存在某些方面论述不深,若干史

事考订不确，结构间有松散，笔调不一等缺陷。所以，这部书的修订任务还相当艰巨。

尽管停辍了 10 年，但随着国家的拨乱反正，我原有的一点学识，也得到了恢复，并有所进展。1979 年起，相继发表了 20 多篇文章，自忖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重建和发展不无添砖加瓦的微劳。其中多数是论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篇什，分别探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孕育、产生、形成和分为不同阶层的过程，以及它在近代各不同阶段上的地位和作用。我的见解是：中国有明中叶后虽然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基于封建制度的某些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致不曾产生像西欧那样的市民等级。这样，鸦片战争后，当中国社会自身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的时候，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买办）就出而顶替，充当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世纪末，投资近代企业的大部分是官僚和买办，他们一般还没有完成蜕化的历程；资本主义经济也很微弱。因此，这个阶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据此，我认为学术界一般把戊戌变法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运动看待，显与史实不符；确切地说，这个维新运动恰好是反映了还没有独立社会地位的、正处于陆续转化的资本家集团的处境和愿望。从种种迹象去考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应形成于 20 世纪初，并相应地产生上层和中下层的分化。此种情形，既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跃登政治舞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也使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立宪派日益活跃，把国会请愿搞得有声有色。从清末至五四运动前，中国局势的演变，政潮的起伏，不难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派别的关系中探寻到因果脉络。今后，我打算就这样一个粗略的体系，撰写一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

我于1961年冬被任命为湖南师院历史系副系主任，主持系务工作。1963年晋升副教授。1980年任系主任，升任教授。1981年任学院副院长，1983年10月任院长。1984年9月，改名湖南师范大学，任校长。目下兼任的学术团体的职务是：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湖南历史学会理事长。

花甲之年刚过。我的愿望是：能在二三年内摆脱一切行政职务，专门从事学术工作。计划有：继续与章开源同志等合作，编纂一部《辛亥革命编年实录》；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续编）的编纂工作；1987年起修订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与此同时，还参与白寿彝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将偕章开源、龚书铎同志分担第十二卷《近代前编》的主编，参加戴逸同志为首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辑组”，分担编辑任务。此外，我还不自量力，担任“《魏源全集》编委会”主任委员，不时得为此事张罗奔走；今冬明春，将与周秋光同志合作，完成《熊希龄集》的编纂计划。工作如此繁杂多头，能兑现吗？好在我们的后续力量已上来了，他们中有的正崭露头角。这使我满怀信心。

1984年甲子孟冬于岳麓山

（原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9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目 录

治史琐言（代序）

学史琐谈	1
关于“史学危机”的思考	4
加强对祖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 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	9
熟悉湖南近代史， 进一步做好我省文史资料研究工作	17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24
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	38
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发展	47
广州群众“反河南租地”事件年代辨误	64
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有待进一步探索	71
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洋务运动	82
近代湖湘文化试探	90
清末留日中国学生反“取缔规则”斗争	115
辛亥革命史丛谈	128
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	140

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	157
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的性质问题	166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和农民	181
会党与辛亥革命	194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赞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	203
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	211
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	239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刘道一烈士的历史地位	264
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	270
辛亥革命在湖南	293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保路运动	300
民国初年宗社党掀谈	344
试论民国初期的议会政治	351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369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	40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449
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一	454
洋务派——早期官僚资产阶级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二	464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三	473
孙中山早期思想研究述评	485

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500
孙黄交谊与辛亥革命	524
杰出的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	535
宋教仁：为民主宪政而献身的革命家	544
邹容简论	563
黎元洪与武昌首义	570
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评价左宗棠	584
试论熊希龄	587
陶澎的历史业绩	607
文廷式与戊戌变法	613
怀念史学界前辈长者黎澍	618
《黄兴年谱》读后	620
《廖仲恺和何香凝》读后	623
介绍《走向世界丛书》	626
介绍《石叟牌词》	629
从历史的深度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评新著《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觅踪》	635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探索	
——评《清末社会思潮》	640
《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绪论	645
《中国近代史参考地图》序言	664
《大学语文》序言	667
《人与神的捭阖》序	669
《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前言	672

《谭嗣同评传》序言	677
《丘逢甲传》序	685
《卢汉传》序	690
《中国近代史实正误》序言	692
《简明中国军事史》序言	703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序	705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序	713
《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序言	715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前言	719
《黄兴研究》前言	725
《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序言	727
《刘揆一与辛亥革命》序	730
《黄乃裳传》序言	732
《湘中人物传稿》序言	736
左宗棠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739
左宗棠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741
黄兴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744
黄兴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746

学 史 琐 谈

解放前，我进入大学历史系，主要是对这门学科感兴趣，并没有领悟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真谛。但因为既选择了这一专业，就不能不经常和故纸堆打交道，从而在阅读古籍，使用工具书，整理和考订史事等方面，获得了若干知识和方法，为此后从事研究工作练就了一点浅易的基本功。

真正理解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意义，是在解放以后。从 1949 年春夏起，此后几年间，我的主课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使自己具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搞好这一主课的学习，首先当然是学好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认真、刻苦、反复地学好主要的马列主义原著所产生的效益，是每个学术工作者都能感受到的，我这里就不作赘述。其次，是有选择地阅读几本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著作或教材，这有助于使自己学到的理论条理化和系统化。再次，是选读几种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编写的历史书籍，也能获益不浅。我当年选读的是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前辈史学家的著述，读时也择要做些札记。无庸讳言，这些从 30 年代到 50 年代初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不够完善之处，纪事立论也偶有失误。然而，在探索不同阶级社会性质，阐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剖析史事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上，毕竟作了开拓性的、向导性的工作，其前